

证词

小

说

界

文

库



刁 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I 247.5 / 2331

Xiaoshuojie

小说界文库 / 长篇小说系列

刃 斗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Wenk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证词/刁斗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小说界文库)

ISBN 7-5321-1952-1

I . 证 … II . 刁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089 号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袁银昌

证词

刁斗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197,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21-1952-1/I·1579 定价：13.00 元

“小说界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江曾培
副主编 邢庆祥 郑宗培
编 委 孙 颤 江曾培 邢庆祥
郑宗培 左 泥 张 森
魏心宏

出 版 说 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长篇小说系列

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年选系列

专题选系列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8月

目 录

(又称“关于《证词》的故事进展”)

作者的话	(1)
法院的布告上划了一串红“×”	(11)
那个神秘的洞穴从书页之中裸露出来	(24)
一条黑龙在我的白阵里苦苦挣扎	(43)
就管这个不能让我完全看清面孔的女人 叫米丽亚姆吧	(60)
能带来疼痛的并不一定只是伤口	(77)
尚未死去的黑鱼用一只眼睛与我对视	(93)
女人的气味难以混淆	(107)
钥匙上凸凹交错的锯齿棱角分明	(123)
警察击毙毒贩的消息登在前一天晚报的 头版下角	(141)

- 阳光透过窗纱洒在床上身上 (154)
两条狼狗大摇大摆地从贵宾候车室
 走了出来 (166)
长颈酒瓶欲进未进地插向两瓣撅起的
 红唇 (182)
肿瘤专家的目光麻木冷漠 (194)
空荡荡的房间好像刚刚遭到洗劫 (210)
我要求自己做爱的时候不要溜号 (227)
把四本“红旗笔记”寄走以后 (245)
铝合金门玻璃发出来的破碎声异常巨大 (259)
死刑犯人的行列里有一个女的 (274)

作者的话

实事求是地说，读者，这部被我取名为《证词》的小说，我是说它的手稿，是我捡来的。擅自把一部捡来的小说手稿发表出版，并署上我的名字，这我需要做点解释。

半年前，远在拉萨的朋友艾平对我发出了邀请：过来看看吧刁斗，我在这里也算站稳脚跟了，吃（有一个叫卓嘎的藏族姑娘和艾平生活在一起，可以为我们做饭）住（艾平已经买下了一套建筑面积为一百零八平方米的三室一厅住房）玩（艾平还有了一辆中外合资生产的庆铃牌小轿车）都不成问题。

能够衣食住行全都方便地走一趟号称世界第三极的雪域高原，这对谁来说都算得上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我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邀请。

可尽管艾平的邀请被我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下来，我却并不想就那么简简单单地启程上路：从沈阳飞到或者北京或者西安或者成都后，再转机一气飞到拉萨。这样的行程太平淡

了。我想的是，要采取一种更复杂更麻烦更困难甚至更危险的方式走向艾平，我要让艾平看看，我并不是一个吃不得苦冒不得险的秧子货胆小鬼。回想当年，艾平拉我去外边见世面闯天下时，我的犹犹豫豫出尔反尔已经让我丢够人了，这回有了这么个机会，我得多多少少找回点面子。

于是，面对一本《中国旅游交通图册》，我作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浪漫决定，要以艾平当年只身进藏的方式去见艾平。

读者，你也许在笑我太孩子气了。没办法，我的学生都有当上副教授的了，可我还像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书生。好在这次我“刚”的对象只是艾平不是别人，而艾平，他尽可能嘲笑我别的举动，对我的浪漫他却肯定欣赏。我这样给你说吧，如果你也认识艾平，从他的相貌上你就能看得出来，虽然他比我还要大出几岁，可他完全就是一个顽童类型的人。对了，艾平那副不英俊不漂亮但却又天真又狡黠的光辉形象，中国美术馆的藏画厅里就有。西藏有个叫于小冬的画家，画了一幅叫《与拉萨干杯》的大幅油画，有一米八高，两米一长，现在已经由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什么时候中国美术馆若搞馆藏展，你不妨去看看。那幅大画上画了一群正在和曾经在西藏生活的年轻艺术家，一群理想主义者，里边有写小说的马原和扎西达娃，有写散文的马丽华和色波，有写诗的贺中，有当导演的牟森，有搞摄影的罗浩，还有死去的女作家龚巧明和出国的女作家皮皮，其中也有艾平。艾平那时是画家。我说艾平“那时”是画家，是因为他已经好几年不画了，现在他是商人。艾平由画家而商人，就跟他的孩子脾气很有关系。艾平刚到拉萨那会，一文不名，卖画的收入朝不保夕。他不像别人还都有个铁饭碗的工作，至少每月有笔固定收入。他没有，他在沈阳是辞

去了讲师的职称和丈夫的职称后去的拉萨，那时的他，有时连画画的油彩和笔都得管别人要。他的情况传回沈阳，他原单位把他挤走的领导就宽宏大度地给他捎话了：艾平是人才嘛，在外边混不下去了，回来我们还欢迎，当然不能再翘尾巴了。艾平果然没翘尾巴，因为他并没有立刻赶回沈阳去臭骂他原来的领导一顿（他买不起机票），他只是告诉捎话的人，让他们看着吧，我会比谁混得都好，然后他就放弃画画做起了买卖。结果他这买卖一做，就做到了十年以后的今天，做到了他可以扬眉吐气地对我说他“站稳脚跟了”这样一个程度。当然他始终不能忘情画画，他在邀请我赴拉萨的长途电话里还说，他很快就会放弃生意上的事情靠吃银行利息来重操画笔。我相信他能说到做到。他和我认识的其他许多人不大一样。

就这么着，如此性格的这个我去见如此性格的那个艾平了。我不仅放弃了方便快捷的空中飞行（不是钱的原因），连相对方便快捷的火车我也基本放弃了，以坐汽车为主，向万里之遥的拉萨挺进。并且每到一处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也不找当地的熟人帮忙，完全是以一个假冒伪劣的流浪汉形象，辽宁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安宁甘肃青海地一路走过去，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青藏高原，九死一生地出现在了拉萨金珠西路八十八号院艾平的家里。

发现《证词》，就是我住进艾平家以后的事情。

从青海格尔木始发到拉萨的长途客车，每周都有三班五班，买票上车很是方便。可那天我却并非鬼使神差地爬上了一辆过路车，一辆由成都开往拉萨的过路客车。照理说，从成都来的车已经经过好多天的长途跋涉，早就人困马乏了，坐这种过路车走，肯定要比坐由格尔木始发的车走危险系数更大

一些。可我却偏偏对那个显而易见的危险情有独钟，我知道，这也跟当年艾平的进藏方式大有干系。当年艾平的流浪没有目的，到了成都，在杜甫草堂看了大半天竹子后，他就忽然决定了要去闯荡一番雪域高原。他想沿着川藏公路进入拉萨，那样至少路途显得近了一些。可后来他被几个开车的军人劝说住了。军人告诉他，“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可不是李白的信口夸张，川藏公路危机四伏，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艾平接受了军人的规劝，坐上了走青藏线的长途客车，绕个大圈子进了拉萨。现在的我，毕竟比当初的艾平各种准备都要充分，早在沈阳就打听好了，川藏公路是走不得的。所以我没绕圈子，而是径直走到了青藏线上。可为了求得某种内心的平衡，我还是渴望尽可能地去模仿艾平，即使不从成都出发，我也得乘坐成都至拉萨的那趟过路客车。

开初的一段路程如何美仑美奂，我就不必多做介绍了。前两天走青海湖，走都兰，我在日记里就曾写过：青藏高原，首先就应该是画家的天地，即使是一个天赋平常的画家，只要勤奋用功，在这里认真地干上三年五载，必然也会成些气候（这样的观点在我进入西藏以后更坚定了）。我要说的是后来，车过五道梁以后。五道梁是可可西里山脉北麓一个普通山脊，距格尔木约三百公里，海拔超过了四千米。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我虽然也已身在高原，但我在的都是四千米以下的高原；从通过五道梁开始，一直到抵达拉萨东北方向一百公里外的羊八井，我在的则都是四千米以上甚至五千米以上的高原。车过五道梁时，我前边的一个四川人指着道边的一块牌子告诉他的同伴，看，五道梁，四千了。我随着那个人的手指也向那个写着“五道梁”的蓝色牌子看了一眼，心里边不由翻腾出

来一句彭斯的诗：我的心啊，在高原……就是这时，在我的心里刚一翻腾出彭斯的诗句时，我忽然就意识到我的情况不对头了。我发现，我的脖子以下，耻骨以上，也就是我肚子里边的五脏六腑吧，同时出现了那种一陟一陟酸溜溜的感觉。开始我还以为我肚子里边的感受是针对我的诗情画意而来的呢——也是的，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在像他的人一样蓬头垢面的长途客车里摇头摆尾地默念英国大诗人的著名诗句，难免有点让人犯酸。可紧接着我就明白了，造成我五脏六腑都不安生的，绝对不是心理问题，而是生理问题。我想呕吐。

我知道我是出现了高原反应。

遗憾的是事情并不仅此而已。以前我还喜欢喝酒那会，同样的情形在酗酒以后经常出现，凭经验，我知道该如何调理情绪控制反应。可这时的状况有些严重。海拔明显的越来越高，长途客车又像一条浪中游船那样颠簸剧烈，任凭我怎样闭目养神调节呼吸干咽唾液纹丝不动，肠胃里边那些已消化正消化和未消化的食物还是一阵阵地返到了喉咙眼处，就像河里的漂浮物最终都要聚积在闸门口一样。挺了大约有三四个小时，天黑透了，估计是在沱沱河一带，我终于忍无可忍了，我请求司机把车停下。司机停车，打开了车门，我还没有挪下车去，胃里边的东西就冲出了喉咙。那些东西在我胃里已经翻江倒海地积蓄了许久，如今破闸而出，其势之凶猛简直不可阻挡，好像只一下子，就被我全部吐了出去。车上的其他乘客对我这样的高原反应已司空见惯，他们说呕吐没事，不发烧就行。只有司机和售票员比较紧张，他们问我能不能挺住。我故做轻松地说走吧，挺得住。我知道，到拉萨还得有三十多个小时，即使遇到天大的麻烦，我也必须挺住。司机和售票员说

老天保佑，你可别再发烧，要是有热度赶紧吱声。其实这时我已开始发烧，额头滚热，身体打抖。手头是没有体温计，有的话，量一量，我想我的热度不会低于摄氏三十八度。可我能说吗？我很清楚，在高原发烧是一件大麻烦事，搞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可是这里一车人呢，又是在这样一个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荒凉地方，我说我发烧，除了让全车的人或者跟着我着急上火或者心中烦我厌我，还能有别的作用吗？我只能硬挺着。其实我的高原反应相当严重，除了继续存在的恶心和发烧，撕裂般的头疼也在一阵强于一阵地向我袭来。恶心呕吐的体验和发烧体虚的体验以前我都有过，可如此的头疼我则头一回领教。我不是说以前我头没疼过，但疼成那样一种样子，却着实让我大开眼界。那时候，我的脑袋好像很大很大，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里边游走冲撞，从左太阳穴到右太阳穴，从前额头到后脑勺，那个东西不知疲累地走来走去，走到哪里就把剜心割肉般的疼痛带到哪里。那种疼痛无所不在，可又疼得你摸不着边际找不出处，让你只想操把快刀齐脖根把脑袋切下来扔出车外。可即使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在心中暗暗祈祷的，却是让掌管病魔的什么鬼神留住我的头疼，而把发烧和恶心这两项毛病带走。理由很简单，发烧会死人的，可我不想死；至于恶心，它会导致呕吐，而呕吐让别人讨厌，又能暴露我身体的真实状况。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掌管病魔的什么鬼神，如果有，想必它一定是跟我有些旧仇新恨。因为我的祈祷反倒让它变本加厉，它就像当年艾平的领导对待艾平那样，不依不饶地用发烧恶心和头疼这三项刑罚向我大施淫威，使我连祈祷的力气都没有了。在以后的二三十个小时里，我所乘坐的这辆长途客

车是怎么过的温泉，怎么过的唐古拉山口，怎么过的安多和那曲，怎么过的当雄和羊八井，我基本上都没有印象。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昏睡——其实说昏迷更加准确，如果没有昏迷，我肯定没法入睡，光是脑袋的那种疼法就会让瞌睡退避三舍的；中间有过几次苏醒，两次是下车撒尿，两次是下车呕吐，可那几次苏醒我也只不过还能意识到天亮天黑车停车走而已。当长途客车到达拉萨客运站时，车上的人都走光了，我还没有半点知觉。是那个叫占堆的客车司机把我从昏迷之中唤醒过来，又从我嘴里抠出来艾平家的电话号码，把我来到拉萨的消息通知给了艾平。

我在医院躺了两天，艾平在医院陪我，卓嘎一天三顿给我们送饭。这两天里，大概那个掌管病魔的什么鬼神又和我好了，它让三种病魔按我先前的祈祷顺序从我的身上依次撤离：我先是不发烧了，然后不恶心了，最后带着轻微的头疼回到艾平家里。到他家后，头也不疼了。

回到艾平家后，艾平和卓嘎让我在他们已为我收拾好的房间里再躺两天。艾平指着写字台上的电脑说，我把电脑也放这屋，等你缓过来了，用它写小说。还没等我说什么，卓嘎又指着写字台下边的一大一小两个包说，你就带了这两个包吧？但愿没丢什么。

写字台下，那个大个的黑红两色尼龙布牛仔包肯定是我的。不光这次从沈阳一出发我就背着它，这几年里，我东走西逛地也都是背着它，它的哪个拉链不好使，哪个挂钩有毛病，我都一清二楚。可旁边那个鼓鼓囊囊的黑色老式人造革公文包，我却看着眼生，它也是我的吗？我一时倒叫不准了。我家里当然也有这种样式的公文包，头些年开什么会，动不动就能

发一个。可我敢说，这样的东西我从来也没用过，太难看了。我让卓嘎把那个公文包递给我，拉开拉链，只看了一眼，我就说这不是我的。我只背了那个牛仔包出门，我说，没带别的包。艾平说好，没丢东西，倒多东西了。我说可能是别的乘客带的吧，你当是我的呢，就拎了回来。艾平说，我找到你时，车上只有你这一个乘客了，而你脚下，就是这两件东西，我当然要认为它们都是你的了。说着话，我们又把公文包里的东西掏了出来。没有钱，没有身份证工作证介绍信一类的东西，也没有其他单独的零七八碎的小玩艺，整个公文包里装的，只是一个细麻绳捆着的沉甸甸的牛皮纸包。隔着牛皮纸包装，我们能够摸得出来，里边好像是书本一类的东西。后来我们决定赶紧把这个公文包送到长途汽车客运站去。艾平就去了。可半个小时后他回来时，公文包仍然在他手里。他解释说，我坐的那辆客车已经返回成都了，而客运站的人说，这两天并没人来找丢失的东西。艾平要把包留在客运站，客运站的人说，你愿意留下就扔那吧，不过可别是炸弹啥的。艾平看看他们那种漫不经心的样子，就改了主意，把他家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客运站的人，他说如果有人来找一个老式黑色公文包，就让那人往他家挂电话。我认为艾平做得对，把包留在我们手里，会比交到客运站更安全一些。

这天晚上，我感觉我的精神头足了许多，就坐在被窝里，把公文包里的牛皮纸包又拿出来。解开细麻绳，拆开牛皮纸，我看到，里边包的，果然是一些笔记本。那些笔记本都是六十四开的小笔记本，全部套着灰塑料皮，数了数，一共多达三十九册。这三十九册小笔记本，一概的印制草率做工粗糙，但随便一翻，里边的圆珠笔字迹倒挺漂亮，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

满了每一本的每一个页码。不过让我吃惊不小的，还是笔记本的灰皮封面，因为每一张灰色的塑料皮上，都烙着三行醒目的黑字。前两行是黑体大字，不太规则地占据了塑料皮的正中央，上边是“坦白从宽”，下边是“抗拒从严”。在底下贴近塑料皮边缘的地方，是一行不大居中的仿宋体小字：“辽宁省劳改局制”……多么巧呀，它们居然和我有着同一个故乡！

读者，这回你明白了吧，现在摆在你眼前的《证词》，就是这样来到我手里的。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和这部《证词》纠缠在一起，西藏有那么多好玩的去处，竟都被我轻易地放弃了。布达拉宫有名吧，还有大昭寺、哲蚌寺、罗布林卡什么的，又都近在拉萨市内，可我不撒谎，我在拉萨住了两个多月，从它们身边不知经过多少回，可我没有进过它们任何一个地方。我也没在艾平给我预备的电脑上打一个字我的小说，我夜以继日地干的，是把这《证词》输入电脑。因为我觉得，《证词》能够落入我手，似乎有些命定的意味。想一想吧，如果这一堆笔记本被别人捡去，比如司机占堆或坐在我前座的四川人，他们除了把它投入炉膛顶替一铲牛粪，还会给它派什么用场呢？一字一句地把《证词》在电脑上打出来并对文字稍作加工润色后，我也该结束拉萨之行返回沈阳了。我把《证词》的原稿，也就是那三十九册小笔记本留给了艾平，我仍然希望失主会找到艾平；我是带着装有《证词》的电脑软盘蹬上离开拉萨的飞机的，我也希望《证词》事件能够在沈阳得到了结。一会从下面《证词》的正文里，你可以看到，《证词》的故事恰好发生在沈阳，它的主人公也显而易见是沈阳人。作为老乡，我对能找到另一条物归原主的渠道充满了信心。可是遗憾得很，虽然在沈阳的文化

圈里我游刃有余(《证词》的主人公是个读书人),还很少有人是我无法搭上边的,可在这座我活动了几十年的家乡城市里,我按照《证词》的线索寻找《证词》人物的工作却总是半途而废。常常是我以为我已经抓住一些蛛丝马迹了,可眨眼之间,那些蛛丝马迹就会莫名其妙地踪影全无或者一波三折地把我引入歧途。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沈阳的文化圈虽然很小很小,但作为一个陷阱来看,它却深不可测而又漫无边际。我缺少掩饰的努力一掉进这个似小实大的陷阱里,就会像一片秋叶落入水中。当然了,也许沈阳这个所谓的文化圈子,是在有意地保护《证词》的故事和这个故事里的人物以及记录这个故事的作者,也未可知。

总之,我亲眼目睹了我的寻找也变成了《证词》故事的一个部分。

于是我决定暂时放弃寻找的努力,先以我的名义出版《证词》。在此,我真诚地希望,《证词》的面世能帮助我和《证词》的作者一道爬出某座陷阱,即使爬不出来,至少能让我们在那个人人都深陷其中的巨大陷阱里狭路相逢。

读者,也许读过这本书后,你就是那个能够给我提供帮助的人,我殷切地期盼着你的帮助。先谢谢了。